

第一章 总论

研究中国沿海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着这样的逻辑思维进行：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论，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纪转换之际的最重要命题的提出，中国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透视，谋求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选择。

第一节 导论

自 17 世纪下半叶人口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离出来以后的一二百年里，本原意义上的人口学研究却进展不大，而从经济、社会等角度的人口研究发展比较迅速，尤其是人口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优秀代表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在《赋税论》、《政治算术》等著作中曾将人口因素作为引起经济变动的内在力量加以分析，力图说明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庸俗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于 1789 年发表其轰动一时的《人口原理》提出人口在食物供给不受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受土地效益递减规律作用呈算术级数增加，总人口具有一种超乎为其准备的生活资料而不断地、永恒增长的趋势。但他作为牧师反对避孕节育，主张通过饥饿、贫困、战争、瘟疫等“积极抑制”以及禁欲、无力赡养者推迟结婚等“道德抑制”限制人口增长。波莱士·弗朗西斯（Place Francis, 1771—1854）等继承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但主张用避孕节育限制人口增长，被称之为

新马尔萨斯主义；不过在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上，新老马尔萨斯主义并无本质的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完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革命过程中，对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作过许多精辟地阐述。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原本计划写一部人口学专著，但未来得及动笔便与世长辞了；但在《资本论》中，长篇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问题，阐述了相对过剩的人口规律。

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说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即运用系统动力学等方法，将人口与资源、环境、发展放到一起分析，认为经济增长面临“人口爆炸”威胁。主要以埃里兹（P. R. Ehrlich）的《人口爆炸》（1968），泰鞞（G · Taylor）的《世界末日》（1970），麦多斯（D. L. Meadows）等人的《增长极限》（1972）著作为代表；适度人口论，主要以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 1861—1935）提出的人口增加对工农业收益的影响，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lfred Sauvy）的《人口通论》（1952）著作为代表；人口增长经济理论，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美国经济学家汉森（A. H. Hansen, 1887—1975）等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人口增长率下降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停滞论为代表。西方人口经济学代表人物斯彭格勒（J. J. Spengler），发展经济学开创先驱之一的刘易斯（W. A. Lewis）等人，则从多层次、多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上述学说主要侧重人口与经济关系宏观上的考察，在微观方

面则有家庭人口经济理论，尤以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影响为大。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教授。他认为，家庭规模的确定由父母对生育子女的数量选择来完成，而父母的选择取决于孩子的成本与效益。孩子成本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直接成本，即从母亲怀孕到抚养成为经济自立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等的费用，亦即花费在孩子身上直接的货币支出；另一部分为间接成本，即母亲因怀孕、妊娠和哺乳期间损失的工资，父母因照料孩子而丧失的受教育、获取更好劳动岗位、升迁等而减少的收入。亦即因为抚养损失时间而失去的带来收入的机会，故又称机会成本，表现为间接的货币支出。当然，父母想要生育孩子不是为了付出成本，而是想从孩子那里得到一定的效益。主要是——劳动经济效益：孩子成长为劳动力之后，可为家庭提供劳务，或者从事一定职业的劳动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养老保险效益：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不发达，老年赡养不得不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子女；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消费品”，具有满足父母精神情感需要，带来天伦之乐的效应；承担家业兴衰的风险效益：孩子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同未来家庭经济风险相连，影响着家庭经济的继承效益；维系家族延续的效益：孩子作为代际延续的纽带，起着传宗接代的作用；安全扩展效益：生儿育女，人丁兴旺是壮大家庭力量的保证，并且常常同“多子多福”相联系，多数发展中国家孩子对家庭安全具有一种扩展效益。莱宾斯坦指出，边际孩子成本同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效益除消费享乐效益变动不明朗外，其余呈负相关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保障事业的完善，孩子效益呈每况愈下之势。芝加哥大学贝克尔（G. S. Becker）教授发展了莱宾斯坦的理论，提出并论证了孩子的效用最大化，创立了孩子数量与质量可以互相替代的理论，论证了人们

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的客观规律，将其纳入他的人力资本体系，揭示了生育率随着经济发展下降的内在动力。南加州大学伊斯特林（R. A. Easterline）教授，加进因采用控制手段付出的经济成本和克服精神障碍付出的心理成本变量，从孩子的供给与需求两端考察孩子成本与效益的变动，发展了这一理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德维尔（J. C. Caldwell）教授，分析在家庭收入提高、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条件下，财富怎样在父母与孩子中间流动，提出财富流理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之间不乏歧意，甚至具有某些根本的不同；学术界对其评论也褒贬不一，存在某些非科学成分，对我国更不可能完全适用。但是将人们的生育行为与家庭经济状况、利益得失联系起来，揭示人们生儿育女发动的动机，则有其科学的道理。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且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关于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论述颇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将人口视为经济自然力和基本国力的“庶矣哉”人口经济观一直居统治地位，对上策动着当政者的人口政策，对下左右着家庭的生育行为。尽管其间有自韩非至洪亮吉的人口过剩说教，但立说有限，影响甚微。到本世纪开始西方人口学说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相继发表了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陈达创办的《北平晨报》出版《人口副刊》发表不少论著。这些论著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至深，同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适度人口”观点，积极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口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加速资金积累之间的矛盾，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同所需工农业原材料增长之间的矛盾，同提高人民生活之间的矛盾，同发展科学事业之间的矛盾等。可是却遭到批判，包括

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在内的人口科学研究长时间中断。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人口科学发展的春天，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始有较大突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科学地确定了人的因素在生产和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唯物史观为导线阐明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说，特别是适度人口论和增长极限论，已将人口纳入与粮食、资源、工业化、环境共同发展的视野，只是无法突破其固有的局限性。因此，包括人口与经济在内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中早已成为探索的命题，只是没有明确提出罢了。然而随着世界人口激增而来的资源的短缺，某些地区粮食的不足，贫富差距的拉大，陆地、海洋、大气环境的恶化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972年世界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以来，先后提出了“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情况下的发展”、“生态发展”、“连续的或持续的发展”等概念，并最终选择了“持续发展”的提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各国首脑出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下简称“里约环发大会”）会议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体现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基本精神，尖锐地提出人口不断增长与资源有限的矛盾，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摒弃了传统的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选择了与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了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下简称“开罗人发大会”），有182个国家出席，其中有11个国家首脑出席。这次大会的突出贡献，是将人口因素放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位置。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指出，1998年世界人口

可由目前的 56 亿增至 60 亿，各国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满足人们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要求。1995 年 3 月还在哥本哈根举行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联合国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努力。由此可见，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和 21 世纪行将到来之际，谋求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成为人类和各个国家合乎理智的选择。

目前国际上各界对“可持续发展”解释不一，有的偏重环境方面，几次世界环境发展大会都围绕着可持续发展主题；有的侧重经济方面，强调消除贫困和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是关键所在；有的偏重社会方面，注重保证公民参与决策的政治体系和解决不和谐发展的社会体系；有的偏重人口方面，重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力作为一种资源的动力作用。不过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渐渐形成较多的共识，也大致赞同《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关于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概括。主要包含下述一些内容：

消除贫困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在贫困和生产工具落后条件下，人们为生存奋争的直接手段是向大自然索取，典型的例子是毁林开荒，垦植草原，现今热带雨林大量被采伐，对生态平衡构成新的威胁。怎样才能消除贫困呢？只有发展经济，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首先经济要有一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经济要有发展。

控制人口增长和开发人力资源。在人口、资源、环境、现代化建设等各种问题中，人口为其首，其他各种问题程度不同地同人口数量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非更生性资源在减少过程中许多已发出枯竭信号，可更生性资源也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巨大压力。虽然近 10 多年来世界人口出生率

和增长率稍有下降，但总体上看增长势能仍较强劲，联合国预测 1998 年世界人口可达 60 亿，2015 年可达 75 亿，2050 年可达 98 亿^①，抑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仍是一项全球性的紧迫任务。与此同时，一些人口过剩国家的人力资源大量闲置，人口的文化程度、健康水平、妇女和儿童的地位等亟待改善和提高。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也是实现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使生育率下降和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途径。

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面对非更生性资源的绝对减少和可更生性资源的相对不足，一个科学、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正提到世人面前。即人类再也不能对资源进行掠夺性索取，而要在满足发展需要的同时，尽量延长资源可供年限，提高资源使用效益。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

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据科学家估计，地球上生物存在已有二三十亿年的历史，逐渐演化形成相对稳定的生物圈。然而自人类诞生特别是近几百年来迅速增长，却使这个相对稳定的生物圈经受着强烈的震动。1650 年与 1994 年比较，世界人口由 5 亿增加到 56 亿，增长 10 倍，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不断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物资消耗数量增加，品位也越来越高。致使森林、草场大面积开垦为农田，大大减低了大地植被的保护功能，使沙漠增加，气候变得恶劣；工业化发展的结果，能源消耗激增，排放出大量废气、废渣、废水，形成地球变暖等“温室效应”，臭氧洞已构成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的潜在危害，环境污染已经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应是保护环境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1994。

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发展，而不应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发展。将可持续发展解释为“无污染发展”或“无公害发展”固然狭窄了一些，但维护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相对稳定的生物圈，切实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则是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可持续发展应具备满足社会生产年龄人口就业需要的能力，而不是把大批劳动者排斥在生产 and 整个经济活动之外。并且能够生产出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使之安居乐业。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除适度的经济增长之外，还要求建立起公平的分配原则。

技术进步和危险控制。可持续发展追求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密集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多就业手段，及时将导致破坏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告诉公众，谋求解决的决策。

可见，实现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与传统的发展方式相比，要树立明确的生长意识、人口意识、资源意识、环境意识、需求意识和技术意识，并如同《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那样，建立相应的经济、社会、生产、技术、管理、国际贸易和金融等体系。然而无论哪一项内容，哪一种意识，哪一个体系，都同人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经济的发展阶段有着自然的联系，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又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是执行里约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和开罗人发大会《行动纲领》的首要之举。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谋求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对中国走向21世纪有着决定的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里约和开罗制定的纲

领和目标的实施情况。说到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一定要注意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以人口而论，长期以来瓯（琿）腾（冲）分界线基本未变：此线西北占国土面积 52%，人口却仅占 5%；此线东南占国土面积 48%，人口却占到 95%。这一人口地理分布既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反转来又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自然条件的改造。若以沿海 12 个省、市、自治区与内地、边疆相比较，则分布不平衡情况尤甚，本书后面将有进一步探讨。以经济发展情况而论，沿海、内地、边疆相比较，无论生产能力、发达程度和同国际市场接轨的水平，都形成明显的阶梯，近年来“阶梯”还有增高的趋势。从总体上观察，沿海地区与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广大内地比较，人口具有密度较高，生育率较低，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少年人口所占比例较低，城市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乡村人口所占比例较低等特征，人口再生产类型完成或接近完成向着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经济发展则走在改革开放排头，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率先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着经济起飞，创造了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足见沿海地区的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均超前一步，如何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如果研究取得成效，对于内地的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 15 年的实践，沿海某些地区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展现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光。

第二节 沿海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透视

本书中所说的沿海地区，系指北京、天津、上海 3 个直辖市，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9 个

省和自治区，即濒临海洋的 12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不包括临近辐射的省份。1993 年面积约 130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3.5%；人口 48536 万，占全国 118517 万的 41.0%。国内生产总值 18707.7 亿元，占全国 31380.3 亿元的 59.6%（本书中全国除另加说明外，系指大陆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数字，下同）^①，属于人口相对比较集中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结合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地区人口控制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践，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其一，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可持续发展。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但是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一是处在生产年龄段，二是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一个人从生到死均是一个消费者。因此任何社会形态下，生产满足全部人口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构成该社会存在的前提，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成为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宏观上最值得重视的关系。可从价值和实物两种形态上加以考察。

价值形态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经济增长则有多种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都可从价值形态上体现出来。按可比价格计算，1953—1992 年全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 7.0%，人口年平均增长 1.8%；1979—1993 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 9.3%，人口年平均增长 1.4%，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国民经济要上去，人口增长要下来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沿海地区这种转变更明显一些，以 1991 与 1992 年比较，沿海地区人口由 47685 万增加到 4812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年版。

万，增长 0.9%；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由 8863.8 万增加到 11175.2 万，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16.7%^①。从历史上看，除“二五”（1958—1962）特殊时期外，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均高出人口增长速度许多，能否由此得出总体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是协调或可持续发展的呢？我以为不能简单地得出这一结论。因为国民收入可使用额中用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部分要有一定的回收期，称之为固定资产投资系数，目前我国在 3.5—4.0 之间。如此，这个系数便成为维持原有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对于人口增长的自然倍率。按照上例，1991—1992 年沿海地区国民收入增长 16.7% 中的 3.2% 至 4.0%，被 0.9% 的人口增长冲掉了，所余 12.7% 至 13.5% 有可能用在提高人民生活相当部分。这个“相当部分”有多大，还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

一是人口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包括新增部分在内的国民收入使用额分作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两部分，要取得社会总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消费基金至少不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增长。就沿海以至全国情况而论，改革开放前除“一五”时期情况较好外，其余时期消费基金增长迟缓，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要求不相适应。这中间有在高速度、高指标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影响下，积累与消费关系处理不当问题，也有人口增长较快客观上的原因。如 1952 与 1978 年比较，全国按可比价格计算，消费额增长 2.1 倍，年平均增长 4.5%，同期人口增长 67.5%，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仅增长 86.9%，年平均增长 2.4%。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很大改变，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发展方针得到纠正，消费基金得到比较快的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93 年年平均增长 9.3%，加上人口增长因素作用，人均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3）提供的数据计算。

消费基金年平均增长 7.8%^①，增长速度可观。不过不同年份增长幅度差别较大，省、市、自治区之间差距也颇大，沿海某些地方曾出现消费超前发展，也有的地方表现出消费相对滞后，需防止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偏差。

二是基本建设中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例。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部分转入再投资，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直接关系到生活资料的增长，制约着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包括沿海地区在内，全国总的情况是：“一五”时期比较正常，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包括住房）占到总投资的 33.0%；“二五”、“三五”、“四五”则大幅度下降，均占 18% 以下；“五五”情况有所好转，改革开放的“六五”、“七五”和“八五”前 3 年从根本上扭转，除“六五”出现带有补偿性的高增长外，基本稳定在 30% 左右的水平，同“一五”比较接近，使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实践证明，同我国人口增长态势和生活质量提高趋势相适应，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一般不应低于 30%。

实物形态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价值形态上的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增长速度之比固然重要，但由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同，还必须注意到实物形态上消费资料的增长状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提供的资料，以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比例计算的恩格尔系数，1993 年城市为 0.501，乡村为 0.581，均在一半以上，乡村所占比例更高一些。这一水平也恰正表明，目前居民的生活水平处在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基本处在温饱状态。沿海地区情况好一些，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均低于全国平均数，城市和乡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数据计算。

北京,城市 0.478,乡村 0.481。

江苏,城市 0.494,乡村 0.502。

浙江,城市 0.494,乡村 0.502。

山东,城市 0.460,乡村 0.574。

广东,城市 0.489,乡村 0.528。

天津、上海二市和辽宁省,城市高于全国平均数,乡村低于全国平均数:

天津,城市 0.546,乡村 0.533。

上海,城市 0.527,乡村 0.463。

辽宁,城市 0.504,乡村 0.551。

福建、广西和海南三省城市和乡村均高于全国平均数:

福建,城市 0.584,乡村 0.606。

广西,城市 0.537,乡村 0.643。

海南,城市 0.618,乡村 0.672。

河北省情况与众不同,城市 0.460 低于全国平均数;乡村 0.584 略高于全国平均数,总水平同全国比较接近。

对于恩格尔系数,国内外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以为,它从消费结构上反映出居民消费水平,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加以分析,并非恩格尔系数越低消费水平越高。如天津、上海和辽宁城市恩格尔系数高于全国平均数,主要原因在于用在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部分,所占比例较低。1993年天津占 7.4% 辽宁占 5.7% 上海占 8.7% 远低于广东的 10.5%,江苏的 10.4%,浙江的 9.7%。这说明天津、上海、辽宁城市居民的家庭设备用品满足率已达到一定程度,支出费用上升受到遏制。若再分析一步,这种满足率仍受着现有经济和消费档次制约,如在主要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中,电视机拥有率均较高,而组合音

响拥有率远不及广东和北京。所以，对于恩格尔系数的变动，要作具体的分析。同样的道理，天津、上海、辽宁乡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全国平均数许多，表明那里农民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用在衣着、住房、家庭设备等项支出的增多，已达到或接近小康水平。就总体而言，恩格尔系数提供的信息大体上表示出：北京、天津、上海 3 市和辽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5 省生活资料消费水平更高一些，其余 4 省相对低一些。与恩格尔系数相关的沿海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具体情况，见下表 1-1 和表 1-2：

表 1-1 1993 年沿海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构成

单位 元

地区	生活消费支出	食 品	衣 着	家庭设备 及服务	交通 通讯	医疗 保健	娱乐教育 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 和服务
全国	2110.8	1058.2	300.6	185.0	80.6	56.9	194.0	140.0	95.5
北京	2939.6	1404.7	471.9	256.2	143.6	66.7	286.5	152.1	158.0
天津	2322.2	1268.3	310.8	171.9	88.6	59.8	209.9	133.9	78.9
河北	1897.9	872.9	301.9	197.5	74.1	43.3	188.1	134.4	85.9
辽宁	1976.6	997.3	394.7	112.5	50.6	55.0	158.4	131.4	76.7
上海	3530.1	1867.9	413.8	307.3	199.3	67.9	301.0	195.8	177.0
江苏	2310.5	1141.4	313.5	240.8	98.2	32.5	206.0	171.9	106.3
浙江	2855.9	1411.7	364.9	277.6	145.0	80.3	248.5	197.4	130.5
福建	2340.6	1366.3	246.3	173.2	93.2	35.5	167.3	163.5	95.4
山东	1946.8	895.8	349.2	194.6	54.2	48.3	195.9	116.3	92.7
广东	3777.4	1847.3	267.9	396.0	298.0	103.7	347.1	350.2	167.2
广西	2303.0	1236.2	237.9	193.0	84.7	48.7	275.7	137.6	89.2
海南	2403.8	1486.5	184.4	158.7	86.0	83.5	185.6	115.8	103.2

表 1-2 1993 年沿海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构成

单位 元

地区	生活消费支出	食 品	衣 着	居 住	家庭设备 及服务	医疗 保健	交通 通讯	娱乐教育 文化服务	其他商品 和服务
全国	769.7	446.8	55.3	106.8	44.7	27.2	17.4	58.4	13.1
北京	1255.2	604.5	132.8	141.8	116.2	58.0	38.1	145.8	18.0
天津	938.0	500.1	89.5	149.0	57.2	31.8	23.8	71.2	15.3
河北	696.5	406.7	52.3	96.5	36.0	44.1	11.3	41.1	8.6
辽宁	940.4	518.5	98.5	116.0	45.0	40.5	18.6	83.8	19.4
上海	2200.1	1021.6	157.0	357.3	258.6	50.2	65.6	219.7	70.2
江苏	1058.8	531.6	78.4	189.4	90.9	35.1	29.8	82.2	21.5
浙江	1262.5	633.3	94.2	219.0	96.3	50.2	38.5	86.3	44.6
福建	1069.8	648.3	53.4	143.8	53.9	26.0	31.1	79.8	33.5
山东	724.5	415.6	60.2	98.8	40.6	24.7	14.8	60.3	9.5
广东	1391.0	734.0	51.9	236.2	93.0	44.2	59.5	130.9	41.3
广西	705.0	453.5	30.4	75.4	36.9	19.5	14.2	69.7	5.3
海南	725.6	487.4	33.9	51.2	35.3	18.5	19.3	65.9	14.1

由表 1-1、表 1-2 看出，沿海地区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在食品、衣着、教育文化、住房、家庭设备等 8 大类别中，均居于较高水平。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家庭设备及服务”一项，沿海城乡均有 8 个省（市、区）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城市水平最高的广东省为全国的 2.1 倍；农村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为全国的 5.8 倍，相差颇为悬殊。仅有 4 个省（市、区）低于全国水平，但大

多接近全国水平。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沿海地区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生活资料拥有量，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较高档的耐用消费品。如 1993 年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每 100 户拥有彩色电视机 79.5 台，而沿海地区北京达到 107.2 台，天津 94.0 台，上海 93.6 台，广东 91.3 台，河北 88.2 台，浙江 85.0 台，辽宁 83.9 台，山东 82.4 台；录放相机全国 12.2 台，北京 45.6 台，上海 38.4 台，广东 27.6 台，天津 23.4 台，浙江 15.7 台，辽宁 15.0 台；照相机全国达到 26.5 架，北京 82.4 架，天津 48.4 架，上海 45.8 架，浙江 29.7 架，广东 29.5 架，辽宁 29.0 架。同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 100 户拥有彩色电视机 10.9 台，沿海地区北京达 53.5 台，天津 40.3 台，上海 35.5 台，广东 23.1 台，辽宁 21.9 台，浙江 19.8 台；照相机全国 1.0 架，北京 12.0 架，上海 4.0 架，天津 3.5 架，福建 2.3 架，浙江 2.0 架，江苏 1.7 架；电冰箱全国 3.1 台，北京 43.3 台，上海 42.3 台，天津 20.0 台，浙江 13.2 台，广东 5.1 台，福建 4.1 台，山东 4.1 台，辽宁 4.0 台^①。显然，就实物形态的消费资料消费和拥有情况看，沿海地区总的水平较高，只是也有少数省区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沿海 12 个省市区作为一个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解决比较好一些，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是由于在人口生产方面，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出生率况日持久的下降，1993 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 18.1‰，沿海地区除广东、广西和海南略高于这一水平外，其余 9 个省市均低于这一水平许多，上海、北京已降至 10‰ 以内；北京、天津、山东、辽宁、浙江、江苏、河北 7 省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 1.0‰ 以内，上海首次降低到零以下。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沿海地区

^①《中国统计年鉴》（1994）。

原有工业基础较好，是全国轻重工业的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快速发展，面向市场，满足人民消费资料的生产发展更快，使人均占有的生活资料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城乡具备较强的购买能力，1992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1726元，沿海地区达到2302元，高出576元。此外，沿海位于改革开放前哨，不仅直接进口大量生活消费用品，而且也引来国外消费意识，“能挣会花”已成为一些人新的消费观念。这样说并不等于已经达到或实现了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可持续发展，某些消费资料不足仍旧是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以粮食为例，1993年沿海地区共生产17473.5万吨，占全国45648.8万吨的38.3%；人均360公斤，比全国人均387公斤少27公斤，除辽宁、山东、江苏3省外，其余9省（市、区）均低于全国水平。在沿海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可持续发展关系中，目前有的消费资料，如某些机电产品出现过剩征兆，需要适当加以调整；但是基本的方面仍然是短缺经济与过剩人口的矛盾，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和努力发展国民经济，尤其是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将是长期的历史任务。

其二，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学一般将总体人口分成0—14岁为少年人口，15—59岁或64岁为成年或生产年龄人口，60或65岁以上为老年人口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由于年龄组段跨距和特征的影响，成年或生产年龄人口不仅比少年人口多，比老年人口多，而且比老年与少年人口数量之和还要多，是占据数量比例优势的人口。从这部分人口群的作用看，成年或生产年龄人口更为重要。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但确切地说，只有生产年龄人口才是两者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94）。